

# 中西诚信观的比较及其启迪

陈延斌 王 体

〔摘要〕 诚信在中西方都得到普遍的重视,其内涵也基本相近,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中西诚信观各有长短,新型诚信观的建构和我国诚信社会的建设,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吸取中国传统诚信观重自律、重人格信任与西方诚信观重他律、重契约信任的合理因素,从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机制和个人信用机制、加强现代诚信观的宣传和诚信意识的养成教育等方面入手,打造“诚信中国”。

〔关键词〕 中国 西方 诚信观 诚信社会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3)06-0033-05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各种与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相适应的诚信失范现象却大量存在,建设现代诚信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试图从研究、比较中西诚信观的异同出发,挖掘其中合理的积极的成分,以便为促进我国现代诚信观的建构和社会诚信机制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 一、中西诚信观的主要异同

### (一)中西方诚信观的相同和相近之处

首先,中西方诚信的基本含义相近。中国传统诚信观中,“诚”和“信”既有不同的含义,又可以互训连用。“诚”是指真实存在、无妄无伪之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sup>〔1〕</sup>“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sup>〔2〕</sup>“诚也者,实也,实有也。”<sup>〔3〕</sup>“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sup>〔4〕</sup>古人把“诚”视为“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sup>〔5〕</sup>。“信”是指诚实不欺、讲信用、守诺言。如:“信近于义,言可复也。”<sup>〔6〕</sup>“信不足焉,有不信焉。”<sup>〔7〕</sup>“诚”、“信”又可以互训,《说文解字》中云:“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诚信连用即是诚实无伪、恪守信用、不自欺、不欺人、言行一致之义。在西方,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尊重事实和信守诺言。如美国学者迈克尔·D. 贝勒斯所说,诚信“一般被定义为‘忠于事实’或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遵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sup>〔8〕</sup>。美国经济学家福山在其专著——《信任:社会道德

与繁荣的创造》中,将诚信解释为“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认为当今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原动力来自社会诚信,诚信度的高低决定了经济组织的规模。可见,中西诚信观的基本含义是相近的,都包含尊重实际存在、诚实无欺、讲究信用、信守诺言等意思。

其次,中西方都对诚信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西方,历来把讲诚实、守信用、不撒谎作为经典训言。对西方文化和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将“不作伪证”等作为最重要的道德戒律。现代西方社会更是把信用视为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和前提,视诚信为生命,其信用管理相对完善,一个诚信缺失的人在社会中无立足之地,工作生活都面临危机。中国传统道德同样重视诚信,不仅将诚信作为立身处世之道,而且视之为立国之基、兴业之宝。譬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曰:“信,国之宝也。”《荀子·议兵》曰:“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管子·乘子》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孔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对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将“民信”置于“足食足兵”之先,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sup>〔9〕</sup>,甚至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sup>〔10〕</sup>。儒家还把“正心诚意”视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墨家也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

也,无言而不行也。”<sup>[11]</sup>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变法之前也要通过“徙木立信”以取得百姓的信任。

## (二)中西方诚信观的差异

第一,中国人的诚信基本上是人格信任,而西方人的诚信则是一种契约信任。中国自古以来,诚信都是建立在亲人、熟人、朋友信任基础上的,是“在排除商业功利关系的宗法血缘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亲情、朋友情义、社会人情和封建国家宗法关系基础上的道德精神”<sup>[12]</sup>。而在西方,商业贸易发展较早,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契约作为一种商业手段和人际交往原则被广泛地应用在社会生活中,诚信就是建立在以相互承诺、互相信赖、信守诺言为内涵的契约伦理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生活亦然,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民众中广为传播,也足见这种思想的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二,中国人的诚信在本质上以道德为支撑,西方人的诚信则以法律为基础。自先秦起,中国人就将诚信视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一,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相信对方人品、德行基础之上的,基本不需要法律的强行约束。尽管也有土地租佃、物品典当等方面的契约规定,但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种道德的信任。而在西方,作为诚信载体的契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以法律形式来规范、践行了。如雅典在公元前621年制定的成文法中就规定,允许债权人将欠债不还的债务人及其家属卖到国外或变为奴隶。当时雅典的各类经济交往活动不仅有书面形式的契约,而且有法律的担保。<sup>[13]</sup>至于今天的西方社会,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更成为西方人遵守诚信原则的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

第三,中国人的诚信观是伦理意义上的,故而重在感性、情理,而西方的诚信观更多是法理意义上的,故而重在理性、法理。中国人的诚信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在人们的伦理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体现着温情脉脉的情感至上色彩和极为浓郁的人情味。以家庭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使得诚信观念以情感为支撑,植根于人与人相互信任的土壤之中,在经济等各种交往中甚至以契约的约定或法律的约束为耻辱。西方则不然,西方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生产方式,基于商品

经济和法制文化基础上的诚信,更多地体现了理性至上的观念,以理性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不为血缘、亲缘情感所支配、诱导。

第四,中国的诚信建设缺少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证,西方的诚信具有较完备的制度和机制保障。中国传统的诚信观是在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诚信所调节的多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伦理关系,无需诚信制度和信用机制的调节。但目前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加入WTO、全面介入国际竞争的情势下,中国缺少系统的信用体制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西方由于长期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严密而完善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和制度。在美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安全卡,上面记录着个人的信用信息,在全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查询,任何不良记录都会威胁当事人的生存。在英国,“诚信纳税”是诚信观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严格的法律约束、完善的金融体系是英国人“诚信纳税”的最可靠保证。这种较完备的制度和机制的保障,使诚信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 二、中西诚信观差异的原因探讨

中西方诚信观的差异,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主要体现在:

### (一)社会历史传统

1.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简单的物物交换不需要契约式诚信的规则约束。同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范围相对狭小,大多局限于亲朋、族人、乡人等有亲缘、地缘关系的熟人之间。社会生活圈相对集中,活动范围较为固定,交往空间相对局限,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观念就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使得人们为了友好相处和长期生存与发展,不敢贸然违背诚信道德原则。

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商品经济就很发达,商业贸易发展较早,这就使得契约诚信的萌发和发展具备了社会经济条件。“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在古罗马帝国已成为普遍的商业和司法原则。其后,在西方社会市场经济不断扩大、发展过程中,契约诚信意识和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也不断随之完善。

2. 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强调的是以封建君主利益为中心的所谓的整体利益,实行以远近区别

亲疏的宗法制度。虽然封建君主们也标榜奉行儒家所倡导的“信则民任焉”<sup>[14]</sup>、“君子信而后劳其民”<sup>[15]</sup>，但专制皇权是不可能真正守信于民的。传统的诚信观更多的是下对上、臣对君的绝对忠诚、守信以及民与民之间的诚信，拥有无上权力的君主是不会通过制定诚信法律规范和信用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强调忠君爱国、重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忽视个体生命价值等在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也制约了契约诚信观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则不同，其平等、分权观念影响久远。古希腊哲人极为重视和倡导的个体平等的哲理思想影响久远，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诚信有了一个观念平台。此外，发轫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分权制衡思想也对西方人的观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即便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西方也存在着教权与王权、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权力平衡，使得他们最终达成相互妥协的契约。这种分权制衡也使得契约诚信观念和制度得以深化。

## (二) 思想文化差异

1. 文化背景差别。这种差别对诚信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生存、发展意识的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虽然也具有文化引导机制，但所育化的则不是商业社会中的理性精神，而是关系社会中的个体为获得血缘群体的接纳，获得生存的安全感而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智慧。就是说，一个人只有诚信，才能在亲人、朋友、君臣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并获得生存的意义感，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不义，就会被血缘群体所排斥，在关系社会中，这是令人恐惧的事，如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这样，在中国传统关系社会中，讲诚信完全是忠、孝、仁、义这样的事。忠就要是真的忠，孝就要是真的孝，言语发自内心，言行一致，这就是诚信。”<sup>[16]</sup>在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发达、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平等观念，使人切实地感受到诚信自律能为自身带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诚信”成为持久的物质和精神动力，从而激励人们化为自觉的行动。其二，“信任圈”的文化背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影响。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年的统治地位。儒家文化中的忠君孝亲的纲常礼教和以远近区别亲疏的“亲亲”、“尊尊”思想

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导层面，受其熏染的传统诚信必然是一种以德性、自律为特征的内在诚信。同时，它也制约着中国传统诚信观无法在广泛意义上超越血缘、地缘等关系限制的人文圈，难以在此之外建立更广泛的信任圈。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人的信用是处在亲戚、朋友的较低层次上的信用。尽管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却也不无道理。这种文化背景与西方发达的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也是显著不同的。

2. 宗教信仰不同。如果不把儒家看做宗教——儒教的话，应该说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在中国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较晚传入的伊斯兰教，其真正的信奉者都是少数，这就导致了“传统文化缺乏西方人的宗教体验，对世界的阴暗面和人性的缺陷似乎认识不足，对超越的精神力量的虔诚追求不够。即中国文化的超越感、终极关怀显得不够，文化动力显得不足”<sup>[17]</sup>。而在西方社会，宗教信仰却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体，宗教观念渗透到人们的意识及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像德语、英语等语种中，“职业”和“天职”词义相通，均含有“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宗教意义。关于宗教信仰对诚实守信道德观的支撑，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做过评价，他指出：“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以宗教的绝对信仰精神来处理工作和生活事务，视职业为天职的伦理价值观使西方社会普遍以诚实为行为准则，而职业本身就是目的的职业态度更为近代西方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能量。

3. 法制精神差异。中国长期以王权、皇权代替民权，以人治代替法治，因而法制文化先天不足。虽说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条令，但实际操作中仍是“刑不上大夫”。法制观念中缺乏平等意识，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同时，作为调节各种民事关系的民事立法尤为薄弱。“秦汉以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民事立法主要集中在规定土地所有权、租佃契约、婚姻家庭、遗产继承、借贷关系等领域，极少关于商品贸易、商业信用的规定，而介于商品交易买卖的中介机构也不发达，商业诚信没有生存发展的土壤，有关商业诚信的立法似乎不可能。”<sup>[18]</sup>

西方法制精神历史悠久,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苏格拉底就因为践行雅典的法律不愿逃跑而惨遭毒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均对法律有专门的明确论述。即便在黑暗的中世纪,亦不乏鲜明的法学思想。“文艺复兴”之后,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三权分立”理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原则,法律的作用更加重要,法制观念更为强化。这种法制精神对诚信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牢固的。

### 三、中西诚信观比较对我国建立诚信社会的几点启示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我们看到,中西诚信观各有优劣,异大于同,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正是我国现阶段的诚信建设需要反思和着力之处。这种比较给我们的最基本的启示就是:必须将中国重德性、自律的诚信与西方社会有完备的法律规范和机制约束的诚信结合起来,以求互补之效。

第一,弘扬中西诚信观的优秀成分,建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诚信观念。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信用经济”。重视契约、讲究信用是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保证,离开信用、诚信,任何交易最终都难以实现,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今天尤其突出。不仅如此,信任、诚信甚至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美国学者福山的“三种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经济资本(主要是指资金、资产)和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因此,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同时,他还认为可以把“信任”这种道德理念商品化,信任问题处理得当,就会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sup>[19]</sup>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把传统的富有人情味的诚信观的内涵现代化,赋予其契约信用的理念,将“言必信,行必果”从人伦交往推广到市场经济交往中,从而消除传统诚信观的“熟人圈”色彩;在借鉴西方现代诚信原则的同时,化解其“夏洛克”式的冷冰冰的呆板的契约观念,在法制原则下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建立起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诚信观。

第二,实施德法合治的治国方略,充分发挥正确诚信观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西方以法

律为基础的诚信观,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但即便是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据统计,美国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就有17项之多),也发生了安达信——安然事件这样严重失信的丑闻,对美国和国际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这表明再完善的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威慑作用也不是万能的,也是靠人来执行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诚信观的建构上必须将中西方诚信观结合起来,吸取中国传统诚信观重自律、重人格信任与西方诚信观重他律、重契约信任的合理因素,建立更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诚信观。

中国重道德自律的诚信与西方社会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规范的诚信相比各有其优势。关于这一点,连偏颇地认为中国人的信用是处在亲戚、朋友的较低层次上的信用的福山都不能不承认:“虽然契约和自我利益对群体成员的联属相当重要,可是效能最高的组织却是那些享有共同伦理价值的社团,这类社团并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先天的道德共识已经赋予社团成员互相信任的基础。”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德治思想、发挥道德扬善抑恶的导向和调节作用的同时,通过加强诚信立法,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信用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以有效约束人们的失信行为,要加大失信惩治力度,让“失信成本”远远高于“守信成本”,使失信者付出“社会性死亡”的沉重代价。

第三,以建立诚信政府为先导,全力打造诚信社会。在当代中国,政府自身的诚信无疑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内容,而诚信政府更是诚信社会的先决条件和根本途径。与商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不同,作为整个社会的表率,政府信用是建构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从体制上、法律上和道德上对政府信用进行了规范和监督,如美国的《政府道德法》、《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英国的《地方政府雇员行为规范》等等。这些规范的约束,有力地促进了诚信政府的建设,进而为全社会树立了典范,推动了全体公民诚信素质的提高,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机制和个人信用机制。建立诚信政府是建立诚信社会的先决条件,而培育完善的企业信用机制则是建立诚信社会的重点。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企业的诚信,就谈不上现

代诚信社会的建立。企业在经济交往中做到履约践诺,对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作为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构成“细胞”,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是基础。个人信用制度是为证明和查验个人资信度而建立的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档案资料和行事规则。我们要学习西方,建立发达的个人信用制度,记录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诚信表现,并将不良诚信记录在一定范围、一定期限内向社会传播,使失信者慑于惩罚压力而注重诚信。

第五,加强现代诚信观的宣传和诚信意识的养成教育。任何一种道德观念的养成,除了靠法律和制度的强制监督实行外,还需要舆论的宣传和教育的熏陶。要发挥社会信用体系的强大功能和现代诚信观的舆论作用,让守信者充分享受到诚信所带来的种种便利,获得更多的效益;同时,继承中国传统诚信观优良的合理的成分,借鉴西方视职业为神圣的法则,以职业诚信观为突破口,使诚信从业、诚信工作成为每个从业者的底线伦理;把传统的人格信任、“熟人”诚信扩展到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的交往领域,进而广泛推行到“陌生人”的社会信用体系中,逐渐使现代诚信观真正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的伦理准则,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基本品质,从而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支撑。此外,还要抓好青少年现代诚信观的养成教育这个重点。这样,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不断积淀公民的诚信素质,不断增强我国的“信誉度”和竞争力,我们才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

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陈延斌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苏徐州 221116;王 体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 参考文献

- [1] 《礼记·中庸》。
- [2] 《礼记·大学》。
- [3] 《尚书引议》卷四。
- [4] 《朱子语类》卷一九。
- [5] 周敦颐:《通书·诚上》。
- [6] 《论语·学而》。
- [7] 《道德经》第十七章。
- [8] [美]迈克尔·D. 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 [9] 《论语·颜渊》。
- [10] 《论语·为政》。
- [11] 《墨子·兼爱下》。
- [12][16] 吕方:《“诚信”问题的文化比较思考》,《学海》2002年第4期。
- [13] 陈盛清:《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 [14] 《论语·尧曰》。
- [15] 《论语·子张》。
- [17] 王稼华:《中国文化与中国式企业财务管理》,《广西会计》1997年第6期。
- [18] 汪华、尹忠:《市场经济诚信失范原因的法文化比较分析》,《行政与法》2003年第2期,第74页。
- [19] [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容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9、35~43页。